

张渠成  
2015200542

### 启蒙与启蒙的其他可能

当我们发现，我们在小事上越来越精细，在大事上却越来越迷糊时，一种危机似乎已经来临。我们手上有越来越多的操作指南，但关于是非善恶却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去进行判断和践行。人们失去了想像另一种更合理地、符合其本性的生活可能的能力，不耐用主流逻辑去拼出主流逻辑。近几年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，显然与这种启蒙的危机、现代危机密切相关。

关于启蒙，康德曾说：“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”是“启蒙运动的格言”。但是黑格尔也深刻地指出，一种纯粹的、抽象的、任性的理性是一个国家巨大的危险。当抽象个体理性的启蒙高歌猛进时，产生了动荡与灾难；而当其实验遭到挫折乃至理想破灭时，这种动荡与灾难更为深重：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欧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，上帝死了，理想死了，生存代替生活成了一种终极目标，现实的很大一部分也残缺不堪。

在这场启蒙及其社会的兴衰中，自由主义、保守主义、社会主义有的兴起，有的衰落，维持着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平等”这些“普世价值”时而为敌，时而为友。社会主义嘲笑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和勇气追求真正的、彻底的、普遍的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平等”，保守主义则质疑人自觉地去认识与落实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平等”的于礼，往往还伴有一种超然的嘲讽与悲观。自由主义则已经面目全非，时而被

社会主义挤压，时而被民族主义和~~保守主义~~<sup>保守</sup>反客为主，似乎成了个大来炫，以至于人们言说自由的方式成了不去说什么自由，只能说什么不是自由，毕竟人的绝对自主并不自证为正当。

在这样的乱局中，我们看到这些“普世价值”有一个基本的价值预设：理性平等。每个人有足够完善的理性确定自己的幸福。和共同体的善好，知道小字与大字最完善的生活方式，这是限于私人道德领域斗争，为了达到目标可有各种手段。这时候，民主、同意似乎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，价值中立也代替善恶成了政治研究的前提。

然而这或许正是悲剧所在，不同于古典理性以公义求共善，现代理性，尤其自由主义，寻求以私利致公益。不平等即理性可有完美理性，可有政治的差别；平等的工具理性不能有政治的差别，每个人理性只能只有有限和不平等的。

要说明现代理性优于古典理性，就需要历史主义，需要新启蒙是好的基础上大多数人的就是善的。流变与特殊、人为与主观成为一切，去价值判断成为潮流，好坏、善恶、高低都失去了意义。尽管历史主义者将历史本身作为绝对，把进步作为价值，但这种绝对和价值没有自然的根基，不被当作一个“不变之学经”“天地之通义”的指导生活的终极评判标准，而是用并决阶段存在本身来自证合理，最后也会走向价值多元自我否定的虚无主义。